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1.02.017

《憩园》接受的三个视阈

沈 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憩园》作为巴金 20 世纪 40 年代最重要的小说作品之一,在对家庭生活的反思上承继了《激流》系列的精神启蒙,但也因作者对人生和家庭问题的思想转变,启蒙的内核出现了一定变异。在《憩园》里巴金不再热情激昂地批判封建旧家,转而以一种温情和悲悯对小说中的人物报以无差别的人道主义关怀。不同于巴金在其他作品中采用的单线结构,作者在《憩园》的叙事中采用了多线并进的手法,在较短的篇幅中包含了繁复的内容,形成了其复调品格。因此启蒙的承继与变异、人道主义精神和复调品格就成了讨论《憩园》接受绕不开的三个接受视阈。

关键词:巴金;《憩园》;接受视阈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2-0097-05

On the Three Acceptance Perspectives of *Leisure Garden*

SHEN Ji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Ba Jin's most significant novels in the 1940s, *Leisure Garden* inherits the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of *Torrent Trilogy* in the self-examination of family life. However, due to the changes of the author's thoughts on life and family problems, the essence of enlightenment has changed a bit. In *Leisure Garden*, Ba Jin no longer criticized the feudal family passionately, but gave the characters undifferentiated humanitarian care with tenderness and compassion. Different from the single line structure in his other works, he adopted a multi-line approach in his narrative of *Leisure Garden*, which contained complex contents in a short space, thus forming its polyphonic quality and style. Therefore, the inheritance and change of enlightenment, the humanitarianism and the polyphonic quality and style has become the three acceptance perspectives unavoidable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acceptance of *Leisure Garden*.

Keywords: Ba Jin; *Leisure Garden*; acceptance perspective

巴金早期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家庭题材小说,大都可以被理解为以批判封建专制为主题,而《憩园》作为巴金年届中年、进入婚姻之后写就的家庭小说,却很难被简单定义为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小说。《憩园》1944 年 10 月在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时的广告词写道:“这是作者往人心深处走了一步……他在发掘人性”^[1]。的确,在这部小说里,巴金抛弃了他在《激流》系列中那种热情激昂的批判,转而以温情的笔触来叙写小人小事,也因此《憩园》常被视为巴金创作风格转变的标志之一,代表着作者新的成熟。最早对此做出论述的是王瑶,他在新中国第一本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巴金 20 世纪 40 年代的小说做出过整体的评价,他认为在《憩园》中巴金把“以前的那种激动的热情

收敛或潜藏起来了”^[2],虽然他仍然坚持诅咒封建制度和观念加于人们的悲惨和不幸,但是也以深厚的人道主义胸怀,叙写出了这些小人物受戕害的故事。从巴金在小说中批判性情感的收敛和同情性关怀的生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巴金在《憩园》的创作态度和情感的微妙转向:在保留了对封建社会的批判的同时却又对包括杨梦痴等没落地主在内的所有不幸的人都报以了人道主义的关怀。在新时期《憩园》重返接受视野后精神启蒙和人道主义也因此成了最为接受者广泛认可的两类接受视阈,并在四十多年来的接受过程中不断得到了深化。

然而巴金在《憩园》中一方面对于封建社会的观念和专制表达不满,一方面又对人性提倡一种无差别的博爱的观念,在特定的时期却被理解为他世

收稿日期:2021-03-03

作者简介:沈杰(1994—),男,四川冕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界观的矛盾,巴金也因此招致了麻烦。新时期以后,虽然所谓“超阶级人道主义”不再被视为巴金的“阶级立场错误”而成为批判巴金的论据,但如何调和精神启蒙和人道主义两种接受视阈之间的内在矛盾、如何合理化《憩园》中的挽歌情调就成了接受者们研究《憩园》的热点。除去上文所说的思想、情感上的变化,《憩园》与巴金其他小说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其主题与结构的繁复,在《憩园》发表之初,李长之就以“套中套”的比喻指出它叙事结构的复杂性,并对其主题过多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在如今看来虽不免偏颇,但在小说的接受过程中却借由李长之的批评而引发了诸多有关《憩园》主题和叙事结构的讨论,《憩园》也因其主题和结构的繁复而被接受者认为是一部具有复调品格的作品,对小说的接受也由此得到了新的路径。但总的来讲相比起《家》《寒夜》等巴金其他畅销小说所受到的关注,《憩园》获得的讨论深度仍有局限,特别是在对《憩园》的定位和对《憩园》中表现的对启蒙文学自身的再审视等方面还有待继续深入。

一、启蒙的承继与变异

巴金在《谈〈憩园〉》中提到杨老三的故事“我那时还想把它编进一个叫作《冬》的中篇小说里。那个冬天的深夜,我躺在架子床上想到的中篇小说《冬》应该是《秋》的续编,《激流三部曲》的尾声”^[3]。作为现代家族小说的代表,《激流三部曲》的思想源于“五四”那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也因此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旧式家族家长专制的反封建精神,而被作者认为是《激流》的赅续的《憩园》,在主题上也显在地延续了揭露旧式家庭的弊端的主旨。对此,钱理群就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崩溃后,那些纨绔子弟的结局。所以其显在主题与激流三部曲仍有连续性”^[4]。张慧珠也认为:“《秋》只写到高家的衰落,《憩园》却进一步描写了末代封建人物的沦亡。尽管作品里的人物不是一个,但对于读者认识生活和认识作家的政治理想来说,它们之间却有着一定的连贯性”^[5]。与他们有同感的还有杨义,他认为《憩园》虽然在格调上不似《激流》般“热情洋溢、奔腾向前”,但在题材上还是“《激流三部曲》的赅续或补遗”^[6]。《憩园》讲述的是大家庭没落后其不肖子孙的悲惨命运,同时也预言了另一个“新式”家庭因为一些“旧式”的弊病无可避免地走下坡路的结局,从这个角度讲,把《憩园》视为“五四之子”的巴金的文化启蒙小说的延续自在情理之中。然而,也正是在

巴金暴露封建制度对人的异化和戕害的同时,他对造成这一切家庭悲剧的根源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在将新旧两种家庭的毁灭路径放在一起对比时,我们发现旧家的灭亡并没有带来作者所期待的那种自由、有希望的新生活。也因此,巴金不再单纯地认为推翻专制的旧家就能使青年获得健康的成长,《憩园》接受的启蒙视阈也不止于单纯地对旧家的批判。

巴金构思和写作《憩园》的20世纪40年代,正是中国民族危机加深、阶级对立加剧的时代,此时已年届中年的巴金刚结了婚,心境也表现出不同于早年的平和、思想上亦难免受到文化启蒙退潮的影响。对此夏志清就曾指出巴金随着年龄的增长心境日趋平和,“对于早年革命热诚以及乌托邦式的理想(即认为只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人们就会得到幸福),不再存天真的想法”^[7]。也因此他认为《憩园》中巴金所表现出的启蒙精神的内核出现了一定的变异。对此,邵宁宁则是更明确地看到了巴金的批判热情消退背后对于家庭问题的深层次思考,他认为巴金在“继续旧家批判的同时,也揭示出了存在于新式家庭里的问题”。在《憩园》中的姚家,造成《激流》系列中所有家庭不幸的根源的家长专制和封建礼教都不再存在了,但小虎却仍然走向了灭亡。邵宁宁由此就指出了《憩园》对《家》所批判主题的转换:“对家长专制的控诉转向了对子孙不肖的焦虑;对礼教的批判转成了对金钱的警惕”^[8]。对于《憩园》启蒙内核和批判对象的转变逐渐就成为挖掘小说深层次意涵的一个着力点,研究者得以由此去回溯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和心态:聂国心就认为巴金在《憩园》中主要批判的不是封建专制和伦理,而是金钱万能和享乐主义^[9]。钱理群则是认为《憩园》使《激流三部曲》的主题得到了补充和拓展,巴金是要借《憩园》企图来更全面地揭示封建制度和其伦理观念的本质上的罪恶^[10]。走得更进一步的是姚新勇,他从《憩园》看到了四十年代的巴金在战时对于五四“疾病——治疗”的启蒙文学传统的反思,因此他把《憩园》放置到中国启蒙文学传统中,将其视为一个转折性象征,认为小说表现了“五四启蒙文学对自身传统的反思和社会大变动的文学敏感”^[11]。

德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姚斯曾说:“一部文学作品,即便它以崭新面目出现,也不可能信息真空中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示自身”^[12]。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具体作品之前,都处在一种先在理解的状态。《憩园》作为一部描述家庭生活的小说其启蒙

精神正是在巴金先前热销的批判封建家庭专制的家族小说的影响下获得的期待视阈,而随着对文本解读的深入,《憩园》中启蒙精神与《激流》系列的内核变异性也逐渐被接受者挖掘出来,因此《憩园》精神启蒙的接受视阈才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样态。

二、人道主义精神

在写作《憩园》之前,巴金曾回到阔别了十八年的成都故家,故乡的乡音、风俗依旧,而旧居却颓圮了,本家的五叔也因为潦倒而死。世事的变迁让巴金对人生的悲剧和人性的弱点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他不再像以往那样热情澎湃地去谴责封建家长的专制落后,转而以悲天悯人的温情笔触来叙写“小人小事”。在小说出版后不久,李长之就指出《憩园》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似,认为它“最显著的是人道主义的浓厚色彩”^[13]。读者蕤华也发表书评说:“正因人间太少温暖和玩笑”,巴金这部“给人间增添温暖”的小说才会被青年学生所爱好^[14]。由此,人道主义从小说一发表开始就成了接受《憩园》的既定视野,但也正是由于作者在小说中所流露出的对杨梦痴、姚新勇等人的“超阶级”人道主义关怀在特定时期却给巴金招致了麻烦。

《憩园》曾被批判巴金的人作为攻击巴金的主要论据,他们认为巴金在小说中因为“没有阶级分析的眼光、没有割断与地主阶级的联系,因此对一个没落地主流露深厚的同情,给作品造成了致命伤;思想内容错误”。也因此他们断定《憩园》是“很难从中发掘出多少值得肯定的东西”的作品^[15]。这样的评价如今看来显然是武断而偏颇的,但姚新勇却从这种带有狭隘的偏见的评论中看出了某种价值,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那些对《憩园》批判性的文章不仅在某种意义上从正面肯定了巴金,并且相当程度上奠定了后来《憩园》的研究框架。在他看来1976年以后研究《憩园》的文章和之前的文章一样“集中关注的问题还是作品对封建家庭制度的批判与挽歌情调的流露之间的矛盾”。而不同点在于:“以前的文章重在通过揭示作品的挽歌情调,来批判所谓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而现在的文章,则是想方设法调和或取消这一矛盾”^[16]。的确,巴金在同一篇小说中既要表达他基督博爱式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又要保持他批判封建主义的启蒙精神;在批判时保留着温情、在关怀时又不舍弃批判,这种写法是会在小说的接受过程中产生主题不清甚至是自相矛盾的风险的,而在《憩园》接受的深化过程当中不少论者是在以合理化其所为挽歌情调的

方式来试图调和这两个接受视阈之间的矛盾,从而揭示出《憩园》在“反封建”“人道关怀”等外衣下更为潜在而复杂的精神内涵的。

在弥合小说中批判与温情的矛盾时,研究者大都是从《憩园》将封建制度和观念本身与代表了所谓封建阶级但也受到封建伦理戕害的人区别对待这一角度立论的。比如聂国心就认为《憩园》那种“令人回肠荡气”的挽歌情调哀悼的是杨梦痴、万邵华、姚国栋等人受到的“非人”待遇,而不是已经败落的封建大家庭本身^[17]。马玉红则是从认为巴金把杨梦痴的命运“写成一曲世家子弟的悲歌与挽歌”正代表巴金抛弃了青春期简单二元对立的人性判断思想^[18]。而汪应果则是认为《憩园》所要表现的主题就是控诉封建专制制度对统治者本身的反噬,小说越是突出杨老三原先正常的人性与其扭曲后的巨大区别,越能够让读者相信封建专制制度对正常人性的摧残程度之高。因此《憩园》才不得不把“杨老三的性格写得既让人讨厌而又让人同情,而这种同情又特别集中在杨老三的‘怀旧’情绪上、‘挽歌’的调子正是从这里产生”^[19]。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正是在弥合小说中作者的人道主义和启蒙精神之间的矛盾努力中,深化了对《憩园》的意涵的解读,虽然不同的论者对小说中的挽歌情调有不同的理解,但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在小说中表现的一个新态度:“旧家”作为一个承载了亲情、温情的实体,虽然是封建制度和观念“吃人”的直接执行者,但却不应该再让家庭背负了原罪的而成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批判对象。巴金在小说中意识到了真正异化了人的罪魁是藏在有形的家庭背后的无形的观念,因此即便消灭了旧家庭,一切“旧”的力量和意识仍然会附身在别的实体上继续对人性进行戕害,反而家庭当中的有利于对抗封建制度的亲情中的光辉也会被消灭。而那些过去被视为“封建势力”代表的人(杨梦痴等),自己又何尝不是“旧”的观念借以附身而“吃人”的实体而已,既然他们自己也在反受封建制度的戕害,那么又为什么不能对他们加以人道主义的关怀,或者说即便对同为受害者的他们再加以更多的批判,于作者想要实现精神启蒙又有何益?

无论从什么角度去合理化小说中的挽歌情调,不能否认的是,正是因为巴金在小说中不再把家庭视为青年人的对立面,而是以一种温情的笔触去叙写小人小事的悲情,才使得《憩园》成了巴金后期小说创作风格成熟的一个标志,才使得《憩园》蕴含了作者在《激流》所没有的对人生和社会理想的复杂

情感,正如陈思和所说:“巴金的小说由 20 世纪 30 年代的鼓吹反抗与恐怖主义到 40 年代同情小人物的尊严的转换,正反映了这一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由实际的政治理想转换成日常的伦理理想的轨迹。我们如果剥离巴金小说里所谓‘反封建’的装饰性外衣,他的小说所隐藏的另一层更为深刻的意义,仍然能感动今天和未来的人们”^[20]。

三、复调品格

《憩园》与巴金的其他小说最大的区别莫过于其复杂性,早在小说刚出版的第二个月,李长之就发表了《憩园》的第一篇接受文章,对小说“主题过多”、主题之间“彼此抵消”提出了批评,他总结了所有“似乎”可以被看作主题但是没有被作者刻画深入的“端绪”:其一:“两家的故事似乎(对不起,我又要用似乎)杨家是中心”“然而因为把姚家的事写的相当多”“于是杨家一边的悲惨情况便因而削弱了”。其二:“本来好像是重在写三老爷之荒唐、自责、显露了人性的”,可是“最不放松”三老爷的过错的“却是大儿子,便又让读者把注意力分散到伊底帕斯情意综(Oedipus complex)里去了”。其三:“假若是重在虎少爷的失教,可是恐怕书中费的笔墨最多(却也是最成功)的,乃是姚家的女主人昭华了”,于是“虎少爷的问题也就减少了严重性”。其四:“书中好像是借姚太太之口说明文艺的价值所在,让人扩大自己,从别人的苦笑里发现自我”“同时作者更借姚太太的指点,说明自己的作风将有些变革”“于是本书又把姚家和杨家的事归于偶尔的见闻,而作者是重在写自己的写作生活和写作态度了”^[21]。李长之的批评恰好反映出了《憩园》内容的丰富,这种丰富性也的确造成了接受者在解读小说主题时产生的分歧,比如宿美丽就认为《憩园》要批判的是金钱对人性的戕害而非仅仅批判家和家族制度^[22];苟强诗则认为《憩园》不再鼓动年轻人逃离家庭,而是在弥合年轻人与家庭的矛盾,要在冲破旧思想的束缚的同时对家庭进行重建^[23];田丰则是看到了巴金对于“自由”和启蒙的反思和认识,他认为:“小说虽然借助姚太太之口肯定了‘我’写作的意义,但是透过对她无力改变生活现状的真实情状的揭示实际上又否定了启蒙的效力”^[24]。与上述论述类似的对于《憩园》主题的讨论还有很多,但在纷繁的主题论争中其实可以看出一条隐约的主线:不再把家庭置于年轻人的对立面。

在讨论《憩园》主题的复杂性的同时接受者也注意到小说结构上的复杂性。由于《憩园》主题的

复杂,巴金在创作《憩园》时也没有采用他经常采用的单线结构,而是将姚、杨两家的故事以及叙述者黎先生和黎先生正在创作的小说交织在一起,使小说的结构“非常类似于一出戏剧”。不同接受者在对小说具体的结构分析上存在着分歧,有的认为小说是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有的认为小说的情节可以被看成“四条趣味线”,而日本学者坂井洋史则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侵犯”与花园的结构:以名为“憩园”的花园为中心,把叙述事件的发生到结束的过程称为“侵犯”,把小说的叙事展开视为以花园为中心的不同层次的“侵犯”的交错。他认为:“如此交错的几种‘侵犯’构成了一种整体性动力而推动世界秩序的改变,这种独特的结构才能使作品不落俗套,免得平板。作为叙述体裁,只要围绕花园的‘谜’在叙述者和读者之间存在下去……因为叙述者在故事的进行中所作所为均以解谜为动机;读者被对于‘解谜’的期待驱使,迫不及待地翻开书页”^[25]。虽然接受者对于《憩园》的主题的分析仍有歧见,对小说结构的剖析方式也有不同,但正是主题和结构的复杂性使《憩园》成为一部内容丰富且具有复调性质的作品,正如张璐燕所说:“在较短的篇幅内包含了繁复的内容,而且故事之间及其各自内部意绪的冲突构成了文本价值取向与情感指向的复杂性,形成了作品的复调品格”^[26]。

《憩园》作为巴金创作风格转向的一个关键标志,其所受到的关注却远不如《家》和《寒夜》,虽然《憩园》的接受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启蒙精神、人道主义和文本的复调品格等方面生成了众多期待视野,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小说的定位问题:虽然作者自己多次表示《憩园》是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之一,但在对于作品的评价上研究者们却仍有两极化的观点,夏志清认为《憩园》和《第四病室》《寒夜》比起来是最差的一个,杨义则说它是“探索人生和人性的精美之作”,聂国心也把《憩园》与《寒夜》并列称之为巴金的“文学巅峰”。除此之外,如何看待巴金在《憩园》中对启蒙和自由的反思也是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如今的研究大多都强调作者在《憩园》中流露出的对于家庭的逐步衰败的挽歌情调,是四十年代步入中年的巴金对人性 and 家庭伦理的再思考,却忽视了巴金其实在《家》中声讨和谴责高家大院的不肖子孙时也没有对家庭的瓦解完全冷漠,相反他一直赞美母爱,赞扬兄妹、兄弟、父女之间的平等友爱的关系。那么巴金对于家庭和人生悲剧的认识转变能不能完全归结于年龄增长的成熟?其背后的中国启蒙文学对自身重

新审视的深层敏感是否有被忽略?以上种种,在如今的《憩园》研究中虽已有论者涉及,却未得深入。《憩园》作为巴金的重要小说之一,深入地研究《憩园》的意义不仅在于挖掘《憩园》这一部小说的深刻含义,更在于通过《憩园》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把握巴金这样一位高产的优秀作家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

风格的转向过程,甚至可以把握战时被迫从京、沪等大城市流转到内地的广大作家在与内地的乡土中国的亲密接触过程当中所带来的创作风格和精神内核上的转变,也因此接受视阈的再开拓还期待着未来的不断超越。

参考文献:

- [1] 陈思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12):107.
- [2]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册[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566.
- [3] 巴金.谈《憩园》[C]//巴金研究资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406-424.
- [4]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30.
- [5] 张慧珠.巴金创作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310.
- [6]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63.
- [7]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71.
- [8] 邵宁宁.《憩园》的启蒙精神与伦理矛盾——巴金、鲁迅比较论之三[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6):87-91+112.
- [9] 聂国心.《憩园》《寒夜》:巴金走向绝望的文学巅峰[J].齐鲁学刊,2009(2):148-151.
- [10]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30.
- [11] 姚新勇.《憩园》:五四启蒙文学的一个转折性象征[J].文学评论,2002(4):116-124.
- [12] 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4.
- [13] 李长之.书评副刊:憩园[J].时与潮文艺,1944,4(3):110-112.
- [14] 蕪华.书评:憩园[J].综合,1946,1(4):20.
- [15] 佚名.谈“憩园”[J].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语文专号),1959(2):27-30.
- [16] 姚新勇.《憩园》:五四启蒙文学的一个转折性象征[J].文学评论,2002(4):116-124.
- [17] 聂国心.《憩园》《寒夜》:巴金走向绝望的文学巅峰[J].齐鲁学刊,2009(2):148-151.
- [18] 马玉红.《憩园》:忏悔与饶恕的爱的挽歌[J].小说评论,2012(3):169-174.
- [19] 汪应果.巴金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88.
- [20] 陈思和.巴金的意义[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4):137-143.
- [21] 李长之.书评副刊:憩园[J].时与潮文艺,1944,4(3):110-112.
- [22] 宿美丽.《憩园》隐性主题探微[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152-153+156.
- [23] 苟强诗.从“出走”到“回归”——《憩园》对“家”的新思考[J].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10(4):12-16.
- [24] 田丰.理想·自由·人性——对巴金《憩园》多重意蕴的解读[J].北京社会科学,2018(8):36-45.
- [25] 坂井洋史.《憩园》论——“侵犯”与花园的结构[C]//巴金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31-142.
- [26] 张璐燕.从《憩园》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的构建[J].小说评论,2012(3):165-168.